

1 构筑小边

明中期前,大同镇长城已存在大边、小边两道。今考证,大边长城主要建于明洪武、永乐年间,后在成化、弘治年间多次修葺。小边长城初建于永乐年间,真正成型且发挥效能,应出自余子俊的创意督建。

时间回到500多年前的成化二十年(1484),鉴于防边有功,余子俊以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的身份,被朝廷派出总督大同、宣府军务,亦称宣大总督。宣大总督是明中后期为统筹宣府、大同、山西三镇军务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,位列“九边”总督之首,主要职责在于强化北边防御、协调明蒙关系。

为提升管辖区域内军事防御实力,余子俊到任不久即亲率文武守臣与兵卒,组织了一次实地踏勘活动。在40多天的时间里,他们查看宣府、大同边防一线的山川地形,东起四海冶,西到黄河岸边,行程约1300余里。在实地考察中,余子俊发现两地长城防御的短板——边墙年久失修,墩台守备稀少,漫长的边境线上仅存170座墩台,根本无法满足警戒和防御需求。

成化二十一年(1485),余子俊正式向朝廷上奏修筑计划,他在奏折中明确提出“增墩凿堑”,于宣府、大同边墙一线增筑440座墩台,每座墩台长宽高均3丈,同时在墩台之间开挖壕堑,宽1丈5尺,深1丈,形成“墩台+壕堑”的点线防御结构。关于墩台,余子俊在设计时设置长阔各六尺的悬楼,处于对角处,以此增强墩台的御守能力。他还在奏折中特别强调,大同地区计划沿用旧有“小边”故址,从中路起步,每二里筑一座墩台,衔接至偏头关黄河岸边。这一走向成为后续长城边墙走向的基准线。

方案得到明宪宗朱见深的认可,下令相关部门筹备建材、调配人力,于次年四月正式开工。工程启动后面临诸多困境,物资短缺、环境困苦、条件恶劣,给施工带来很大阻力。大同中路除镇城北边地形平坦,其余多过山涉河。史料记载,余子俊“与将士同甘苦,无少私”,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,最终屯军和民役合力筑墩挖壕,形成连贯有效的防御线。

成化年间天灾频发,朝廷的人力、财力多用于救灾,大规模的边墙建设引发部分官员的反对。他们以工程耗费巨大、加重民生负担为由,公开弹劾余子俊。成化二十二年(1486)二月,在多方压力下,余子俊被免去太子太保之职,他主导的宣府、大同长城修筑工程被叫停。整体规划中的防御体系虽未完成,但也发挥一定作用,并为后续的军事防御思想提供了基础框架。嘉靖年间,宣大总督翁万达、和翟鹏、大同总兵周尚文等人在余子俊的工程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加宽壕堑、补筑连贯墙体,最终形成高大坚固的大同镇边墙,屹立至今。

筑长城的同时,余子俊还注重军器的革新,在总督宣大期间,他组织打造“鹞鸽车”,战车辕长1丈2尺,体型较为庞大,每辆战车需10名士兵共同驾拽才能移动。每车配备4门火炮,战车之间的空缺处还会补充放置5尺长的鹿角,以此形成密集的防御屏障,阻挡敌军骑兵靠近。此外,他推行的“屯守结合”策略也为大同镇后续开展屯垦、保障军需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余子俊与大同明长城

提到大同明长城的修筑者,必须了解一位来自四川的大明精英名臣——余子俊。到任宣大总督后,他借鉴修筑延绥镇边墙的成功经验,推动大同镇长城的修筑,为后期长城防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今天在新平堡、得胜口等地,还能看到这位守边能臣的功绩遗存。



大同新荣区头道边长城,据考基础为余子俊所筑小边

2 长久之计

余子俊增筑大同镇长城之举,缘于此前在延绥巡抚任上的经验。

成化七年(1471)正月,余子俊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,巡抚延绥。到任后,他面对边患严重的现实先后4次上书朝廷,力陈修边的必要性。他在首次上书中提出依托高山陡崖,通过铲削、垒筑等方式筑墙置堡。成化八年九月,他第4次上书详细核算军费,指出当年延绥“搜套”(明军为应对蒙古部落侵扰,在延绥镇一带主动出兵河套搜剿的军事行动),相关开支已占明朝全年财政收入的30%,而修边成本远低于此,实为长久之计。这次上疏促使明宪宗下定决心,认可修筑边墙是“经久之策”,同意他的方案。

余子俊抓住机会,采用分段之法全

力兴建延绥边墙。先对北至皇甫川、西至定边营的边墙进行修复和加固,完善周边基础防御节点,为后续整体工程打下基础。同年,余子俊调集4万明军,采用“遇山铲削,逢谷填壑”等因地制宜的施工方法,仅用3个月便完成了东起清水营(今陕西府谷境内)、西抵花马池(今宁夏盐池境内),全长1770余里的连贯边墙。

修筑过程中,余子俊并非只修单一墙体,他着重打造“边墙+城堡+墩台”的立体防御网络,共筑11座城堡、15座边墩、78座小墩以及819处崖栅,每两三里设置一座敌台或崖寨,方便守军瞭望敌情、传递信号和抵御来犯之敌。边墙建成后防御效果立竿见影。成化十八年(1482),蒙古部落再次入侵

延绥时,边墙成功阻断其退路,明军趁机多路出击重创敌军,此后二十多年蒙古部落不敢轻易犯边。边墙修筑后还大幅缩减了军费开支,延绥镇屯兵从8万人减至5万人,每年为国库节约开支619万石。

今天的陕西省榆林市为延绥镇所在地,坊间流传着众多与余子俊修长城有关的故事。高大完备的边墙规范了长城内外的秩序,促进长城内外经贸往来正常化,榆林逐渐成为边贸繁华之地。边墙护卫的农田便于开垦,余子俊把边墙内的土地分给驻军屯垦,每年能收获粮食6万多石,实现了“筑墙备边、屯守兼备”的效果。他还在延绥设立武学,以培训优秀子弟,敦促他们为国尽忠,为边谋固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3 忧勤为罔

翻开明代史籍,对余子俊的评价多赞美之词。《明史》记载其“尽心边计,数世赖之”“沉毅寡言,有伟略”,为官清廉,“自奉简素,不殖货利”,任地方官和封疆大吏期间,他始终以民生为重。修边时尽量调用军卒而非强征民夫,还推行屯垦制解决军粮问题,减少对百姓的赋税摊派,“边民赖其惠,为立生祠祀之”。

“实”,后世评价余子俊的主要用词。“不务虚名,专务实效”“才兼文武,

志在安邦”,勾勒出一个实干家的真实形象。《宣大山西三镇图说》介绍其谋修边墙时,常亲临一线,“身历边隘,手画营垒”,“因地形之便,顺山川之势”,必经实地勘察后才制定出修边方案,体现了严谨的治边思路,认为他“筑墙屯守”之策实为“知边事之要害”的务实之举。

除了边防,余子俊在地方治理中也颇有成效。初任西安知府时遭遇荒年,他当机立断下令开仓赈贷,百姓们得到

救济免于饿殍。彼时西安水质含碱性苦涩,有人建议凿渠引城西河之水入城,虽解用水之急,但浊流失控出现水溢难题。眼见西安城垣损坏危及百姓安居,余子俊决定在城西北方开新渠排水。时人感念余子俊的德政,将该处泄水渠命名为“余公渠”。随后,他又在泾阳凿山引水,灌溉农田千余顷,“民获其利”,余子俊因此被赞为勤政爱民的治世能臣。

文/图 温鹏毅



新平堡边墙遗迹

